

韶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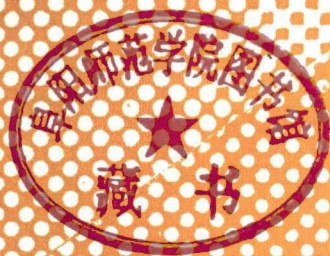
身边人物志

作家出版社



身边人物志

韶华



作家出版社

身边人物志

作者：韶 华

责任编辑：朱珩青

责任校对：祁 斌

装帧设计：倪天煦

出版：作家出版社

印刷：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75 **插页：**2

字数：200千

版次：1988年2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7-5063-0062-1/I·61

统一书号：10248·0238

印数：0001—6,500册

定价：1.90元

(作家版图书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

给身边人物画像

——自序

在我生活的仓库里，存放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装过秫秸棍的子弹袋，地道战中的豆油灯，有“三下江南”^①缴获的军大衣、鸭绒被；也有抗美援朝中的炒面袋，炮弹壳雕成的花瓶，罐头盒制造的胡琴；还有土地改革前贫苦农民穿的麻袋片、皮靴鞅^②等等。这些，本来是可以编织成作品的，但我没有去写。原因是：有许多作家写过了，我不能超过那些作品，写不出新意。

我创作必须是对生活有独特“感受”时才动笔的。“感”就是感觉、观察、体验，“受”就是有收获，有认识，有自己的判断。我感受最深、兴趣最大的是我们当代人共同经历过的社会生活。新中国建立之后，我们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建设，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不管文学观念怎么革新，我坚信，小说还是要写人的，而政治运动最能显示出人的本质、本性。每有风吹草动，各色各样人物就活跃起来，按照他们的思想、性格，演出自己的活剧。随着形势的风云变幻，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悲欢离合、沉浮迭宕、兴衰际遇，也最富有戏剧性。生活锤炼着人，历史也给人开着无情

的玩笑。刚正不阿者，扭曲变形者，投机钻营者，飞沙走石者，现实生活象万花筒似的，每旋转一圈，人群就分化、组合，变换位置。他们构成了一幅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画面，有时候使你觉得简直是一部史诗。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对十几年来社会生活和身边人物进行过思索分析，自以为有所“感受”。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一年期间，我写了二十多个短篇，大多是一气呵成的。后来，因为写长篇《过渡年代》，中断了短篇创作，但还是见缝插针的写了一些。收集在这部中短篇集中的小说，是从近十年创作中筛选出来的。其中所刻画的人物形象，既是我身边的人，也是我亲爱读者的同志、朋友、上级，或者是大家常常见到，共同生活或工作过都认识的人。他们所演出的活剧，也许会使你思索一下做人的道理。果能如此，那就是我最大的愿望了。

作者 一九八七年六月于北京

① “三下江南”——东北解放战争中三次渡过松花江的著名战役。

② 皮靰鞡——东北农民穿的一种牛皮缝制的鞋子，中间植靰鞡草取暖，如今已很少见了。

目 录

给身边人物画像 (自序)	1
“未可及” 别传	1
舌 头	19
上 书	28
你要小心	44
在上面和在下面	79
失律的心	96
徘 徊	105
肠梗阻	116
镜 子	147
深 秋	163
伪 造	229
沉浮三地书	244
老爷子	260
愚 弄	274
寂 寞	288
团 圆 年	293

“未可及”别传

魏开基因患肺癌于前天的黎明五点十分去世了。他在医院里挣扎了两年多，因癌细胞已经扩散，现代医学也毫无办法。按常规，一个干部去世，机关内部应开个追悼会，悼念死者，勉励后继。魏开基是有三十来年工作历史的老同志，和我在一块工作就有二十多年。我是省革委机关党委的一把手，机关党委决定，在追悼会上由我致悼词。我接受了这个任务。

为了在悼词中把他的简历写得更准确些，我从干部处要来了他的历史材料。材料上写着，他是一九二五年阴历七月十五日生在一个上中农家庭，本人成份是学生。从八岁上学，一直念到高中毕业。解放前在他家乡的农村当过两年教员，一年小学校长。一九四九年参加革命，一九五〇年二月入党……历史十分清楚，没有“疤”，“疖”。材料中有若干份“年终鉴定”，“自我鉴定”和历次政治运动“鉴定”。优点写得很多，比如：“工作一贯积极”，“刻苦学习”，“政策水平较强”，“路线斗争觉悟较高”等等；缺点方面大多只写一条：“比较偏激”或“有些片面”……总之，写的全是一些概念话。只凭这些材料判断一个干部，那简直如

入十里雾中。但魏开基在我的脑子里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为了在“悼词”中，对他的一生有个恰如其分的评价，我细细回忆了一下，顿时，一桩桩往事，就在我的脑子里演起电影来。

魏开基是一九五五年春季从某县教育局调到省人委政策研究室做研究员的。因为在县里他是科长，大家仍习惯地称他“魏科长”。那年，魏科长才三十多岁，面皮白净，两眼炯炯有神，分头又黑又浓，谈起话来滔滔不绝，声音洪亮，习惯性地不断往后捋着头发，使你感到这个人很“帅”。作为政研室主任，我第一次和他谈话时，问他对这里的工作有什么意见。他说：“我一直在基层做教育工作。在基层工作，可以更多地接触实际，但也有局限性。如今调到领导机关，经常和省里领导接近，有机会多学习，又能到各地走走，开阔眼界，总结经验，提高得更快些。反正，我一生交给党安排，党把自己放在什么岗位，就在那里发热发光……”

在以后的一段工作中，他的确很积极。或者单独一个人，或者组织个小集体到各地、市、县做调查研究，他总是最先寄来“情况汇报”，到哪里“蹲点”或“试点”，也是最先总结出新鲜经验。党报党刊上又经常发表他的文章。

“魏开基”成了大家所熟悉的名字，在政研室二十来个“笔杆子”中，他算铁耙子搔痒痒——一把硬手。

一九五六年春天，他们家乡的区委，给我们机关党支部来过一封信。原来在农业合作化以前，农村已开始两极分化。在那几年，他们家先后买了十五亩地，拴了一挂胶皮轱

辘车，买了三匹马。让他的一个外甥在他家里干活儿，实际上是个雇工。买地，买马，拴车大部分的钱，都是他寄回去的工资。而且，事前他父亲写信征求过他的意见，他表示积极支持。五五年秋和五六年春，农业合作化高潮中，他们家的田地，夹在合作社的大田中间，他父亲坚决不入社。区委给我们来信，要我们做做他的工作，并通过他做做他父亲的工作，争取他家入社。政研室召开党员大会，对他进行批评。开始他不服，说家里的事情他不知道；他只是每月给家里寄钱，但做什么用他从来没问过。其实他不仅知道，而且支持和干预了他父亲的自发资本主义活动。大家指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站在哪一边，是个立场问题。任何干预和支持剥削的活动，都是违犯党纪国法的。……后来，他作了检讨，态度还算诚恳。为了表示改正错误的决心，他给家里写了信，动员他父亲入了合作社。党组织没有给他处分。

在这以后，有好几个月，他的眼光没有以前亮了，嗓音也不怎么响了，发言也不搞成本大套了。每天沉默寡言，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几次向我表示：“犯这么一个严重错误，我这一生算完了！”

我说：“哪能这么说呢？不在于我们犯不犯错误，在于如何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改了还是好同志嘛！”

人从懂事就会总结经验。经验是手电棒，能够照亮前面的道路。有的人在总结经验后，大抵成直线或“之”字形前进；有的则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魏开基怎么总结他这次犯错误的经验，我很快就感觉到了。

一九五七年春季，党中央号召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以克服党组织某些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思想作风。在大鸣大放时，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有的献上美玉，有的向你倾倒垃圾。献上美玉的也许有斑点；在倾倒的垃圾中也许能捡出几块碎纸引火生炉子……总之，情况非常复杂，要做具体分析。起初，魏开基并没有鸣放。后来，见他写过一张大字报，标题叫做“富农经济失去作用了吗？”，其本意是为他所犯错误翻案。但很快风向变了，他的大字报没贴出来，也就是他收回了自己的意见。后来发生的一件事，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政研室有一个叫程志欣的研究员，在大鸣大放中给我贴了一张大字报，说我有官僚主义作风，对群众生活漠不关心。原因是：他家住在省委院外的一所没有暖气的平房里。他爱人的产期预计是十一月。事前他几次向我提出要求安个炉子，或者拉点煤烧烧炕，都没有得到解决；结果孩子生在了凉炕上。一个星期后，办公厅李主任发现此事，批评了行政科，才解决了问题。他的大字报标题叫“冷酷的心”，是对着我个人来的。在反右派时，魏开基提出：“在右派猖狂向党进攻时，程志欣的矛头对着谁呢？对着我们敬爱的党！他攻击我们的党是官僚主义的党，说我们党的心是‘冷酷’的！这是何等的恶毒啊！这和资产阶级的右派如出一辙！对这种反动言论，如果还不认为是右派的话，那就是严重的立场问题了。就要考虑考虑对谁亲，对谁恨的问题了！……”他义正词严，目光闪亮，讲话时不时把垂在眼前的黑发向脑后捋着。不少同志不同意他的意见，认为对政研室主任和支部书记（当时我又兼

着政研室的支部书记)个人的意见和对党的攻击应该区别开来,对某项工作的批评和攻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应该区别开来。魏开基说:“我们所说的党,是具体的,不能把党抽象化。在我们支部,党支部书记就是党的领导,党的化身!攻击支部书记,就是反党!资产阶级右派总是从批评某项工作来否定整个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归根结底,在当前两个阶级大搏斗中,这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讲完之后,他环视着室内的同志,搜索着辩论对象,有些同志不敢发言了。

我站起来说:“让我解释一下吧:程志欣同志爱人生孩子以前,确实多次向我提出安炉子和拉煤烧炕的要求。我也确实几次和行政科张管理员打过招呼。后来,我很快到外地公出;也可能因为管理员事忙,没有办。但我没抓紧,应负领导责任。程志欣同志提的意见可能尖锐一些,‘冷酷的心’或许说得过分一些,但他的孩子生在凉炕上是事实。我是支部书记,不能说对我个人有意见就是反党。他出身很苦,对党是有深厚感情的。”

这样,才平定了这场风波。事后,魏开基对我说:“我是一片好心维护党的领导,但看问题可能偏激了些!”

一九六〇年春季,从我们政研室抽调几名干部,充实各县领导班子。有被任命为副县长的,有被任命为县委副书记的。对这些研究员,从职务上说,算是提拔。这些同志的资历都比魏开基短,年纪也比他轻。确定人选时,有同志提到过他的名字,机关党委多数委员不同意,首先是我不同意。这些到县里任职的同志一走,魏开基波动很大,他有好多日

子情绪不高。和他住隔壁邻居的同志还反映，最近他曾在家里发邪火儿，连门前园子里种的黄瓜苗子都拔了。还说，他吃安眠药过多，睡前抽烟卷儿烧了被子，差点儿引起火灾。听了这些反映，我赶忙找他个别谈心。他向我表示：他因为犯过立场错误，近几年思想一直背包袱，压得自己迈不开步，在前进道路上落后了。我说：“为什么要背包袱呢？应该轻装前进嘛！过去的问题已成历史……”这次谈话收到了效果。他向我坚决表示：“我一定好好工作，做出成绩，往后看吧！”不几天，我们就派他到某县垂杨公社蹲点去了。

这年秋天，魏开基从垂杨公社寄回来一份调查报告，题目叫做“垂杨公社的产量是怎么过‘黄河’的？”去年垂杨公社的产量平均亩产仅三百零几斤，今年一年跃进到五百八十斤，差不多翻了一番，确实了不起。他在报告中指出：“在社员群众中，普遍存在着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大、小队和公社干部中都有他们的代言人。春季在作物播种方面大搞资本主义经营，秋后则瞒产私分。今年，垂杨公社之所以产量一年过‘黄河’，是不断在干部和群众中反右倾的结果。……”我感到他这篇报告涉及到目前党在农村中许多现行政策问题，就马上到垂杨公社去了。

我到了垂杨公社，听说魏开基在三家生产大队。我赶到三家生产大队。一见面，他就非常兴奋地给我介绍了半年来他在这里蹲点的经验。他滔滔不绝地一气讲了两个小时，并说：“今天晚上开社员大会，讨论明年自留地交公问题。大家情绪很高，决心割掉这个资本主义尾巴！你看，经过狠反右倾，群众已经走到我们前面了！——垂杨公社的报告一发

表，会有很大影响的！”

队部的墙上果然贴了一些要求把自留地归公的大字报。我说：“这可是个大问题，自留地是农业六十条明确规定了的，可不能随便修改！”

他说：“社会要前进，历史要发展嘛！”虽然这时已是深秋，但他仍穿着一件白汗衫。那个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好象是一个打了胜仗的将军。

到底垂杨公社是怎么一年跨“黄河”的，我不能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得调查研究一番。我找了几个队干部和社员征求意见，他们都反映魏科长在这里工作搞得好，使大家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但我的直觉告诉我，大家说的“好”不是真心。晚上，我住在公社，找到一个书记，想和他谈谈心。

谈了一阵闲话，我问这位书记：“你们公社的粮食产量是怎样从去年亩产三百多斤一跃而为五百八十斤的？”

“魏科长的报告写得不是很清楚吗？”他低头回答，连看也不看我一眼。

“我说的是实际，实际情况怎样？”

这位书记沉默了好久，然后抬起头来问我：“魏科长不代表省里？”

“他是我们政研室的工作人员。”我答。

“他说的话代表党的方针政策吗？”书记又问。

“他的责任只是调查研究党的方针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并向上级如实反映情况……”

“唔……”这位书记似有所悟地说，“我们一直以为他

代表省里，他是按党的方针政策搞试点的，我们很尊重他……如果不是这样，我倒想提点问题。”

于是这位书记就说了起来：“魏科长一到我们公社，正赶上春播。一下车，他就向我们提出，要以我们社为点，树立一面旗帜，一年把粮食产量翻一番。他提出的增产措施首先是砍掉各大队几千亩药材的播种面积，而黄芪、生地是我们这里生产的传统的药材品种。接着又砍掉了大蒜、大葱等蔬菜播种面积。公社和大小队干部都想不通，他说这是资本主义经营思想，要开会批判。还指出，地瓜是高产作物，要大种地瓜；一亩地瓜产三千斤，四斤地瓜顶一斤粮，按这个方法折算，亩产就可以‘过黄河’。其次是搞密植，高粱株距不能超过二寸；苞米不能超过五寸。公社和大小队干部还是想不通。大家说，‘八字宪法’是全面地互相联系的，密植要看水、肥、土、种等具体条件，不能一刀切。太密了，反而减产。他说，这也是‘小农思想’，……在铲头遍田间苗的时候，他拿个尺棍儿满地转游。如果苞米株距超过五寸，高粱超过二寸，马上就组织现场批判。……今年秋收开始，我们在密植的高粱地块试测了一亩地，亩产实际只有二百九十斤，比去年反而减产了，目前虽然还没打完场，但据我们和老贫下中农估算，能和去年平产，就顶天了；说不定要减产……”

“那么，全公社亩产平均五百八十斤是怎么算出来的？”我问。

“这里面学问可大了。”他说：“首先，土地亩数不变，砍掉一万多亩药材和蔬菜播种面积，相应地粮食产量增

加一些；其次，第一次分给社员的粮食是湿苞米穗子，连水分也没扣除。高粱还没有打完场，是魏科长按株距二寸，每株三两估算出来的。地瓜是原来四斤顶一斤粮，魏科长说太低了，按三斤半顶一斤计算。这样，满打满算，全公社亩产才四百多斤。魏科长还是不满意。他多次召开大、小队干部会，批判‘瞒产私分’的‘资本主义’倾向，说我们一些干部自觉不自觉地成了这些自发势力的代言人，与他们通同作弊，欺骗国家。他还举出某生产队隐瞒一万二千斤黄豆不报为例，说明这个队干部完全滚到‘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泥坑’中去了。实际情况是：春起的时候，我们公社号召大家在地头田埂点种一些黄豆。社员拿它做大酱，生产队拿它换豆油，分给社员，豆饼在大忙季节做饲料。这本来是不计产量的，现在魏科长让我们统统把这些黄豆都收了上来，按魏科长的话说：一反‘右倾’上‘纲要’，二反‘右倾’过‘黄河’，三反‘右倾’翻一番，反一次‘右倾’，产量上一层楼……现在要按全社平均亩产五百八十斤征购，过了年社员就得吃返销粮。群众意见很大……”

我说：“真，真……”我本想说：“真岂有此理！”但我不好说出口，我还得找些干部和社员群众，深入了解一下再发言。

我又找了一些公社、大、小队干部和贫下中农，进一步调查，到县里又和县委的领导同志交换了意见，大家反映的情况是一致的。后来，县里派了一个工作组到垂杨公社，纠正了魏开基的做法。我们也把魏开基抽回省里来。政研室的同志对他进行了批评，但他始终“保留意见”。

“文化大革命”开始，因为我是政研室主任，属于“当权派”之列，魏开基给我写了许多大字报。他开列我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种种“罪行”，我大多记不清楚了，只有两点印象比较深刻，一是说我“包庇右派”；二是说我那次垂杨公社之行，替农村资本主义势力鸣锣开道；那次我从垂杨公社回来后，根据省委、省人委领导同志指示精神，为了贯彻执行农业《六十条》，还起草了一个《二十条》作为补充细则。他的大字报说这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他是个科长，属于中层干部，虽不是“当权派”，可也没捞到“造反派”的头衔。

一九六九年冬，落实干部政策，我得到解放，随即到农村插队落户去了。插队干部的名单中没有魏开基。在给我们送行的时候，他热情地向我说：“再见！”我心想：但愿今生今世你我不要再见了。

可是，我们终究再见了。一九七三年，我从乡下插队回来，仍然做政研室主任。当时，魏开基还是个研究员。五年不见，虽然他的派头仍然很“帅”，但面貌苍老多了。脸上的皱纹象蛛网一般，眼皮下垂，头发也已斑白了。

这年的秋天，魏开基到市内一个机床厂调查研究。有一天，他忽然打电话找我，说机床厂发生了一件事情，是个苗头，抓住做一篇文章，写一个“简报”或“通报”很有意义。下午厂党委开会，讨论此事，希望我参加一下。我下午到机床厂时，党委会已经开始，魏开基正在发言。原来这个厂前几天开了一个表奖大会，表奖第三季度全厂先进生产者。在讨论奖品时，有人提出以前都奖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

作，不少先进生产者家里都有好几套了，是否给点物质奖。发套茶杯或一条毛巾该不算“物质刺激”吧？大家都同意了。这次会议魏开基没参加，事后才知道。现在他在党委会上大声嚷嚷说：“‘物质刺激’本来是文化大革命中批臭了的东西，现在奖的东西虽不多，但可以看出复辟回潮的苗头儿！……他提出，要开一个全厂职工大会，在大会上砸杯子，剪毛巾，表示和‘物质刺激’彻底决裂，以挽回不良影响……”

机床厂的党委书记把我拉到一边说：“我对你们的魏科长实在佩服！一件小事情，就‘上’那么高的‘纲’，凭他这点本事，就够我们学一辈子的，也许一辈子也学不会。”

这位党委书记和我是老战友，跟我说话不用提防。

我说：“要学会这一套得‘二没’：一没党性，二没良心。”

“还得补充一‘没’：没长眼睛，不看事实。”他笑着说，“哦，他的名字叫魏……魏什么来着？”

“叫魏开基。”我介绍说。

“我看不如叫做‘未可及’。”他哈哈大笑地说，“谁也达不到他那个‘高度’！”

从此，不少同志背后称他“未可及先生”了。

次年春天，省里那位“首长”要到某县去开“社会主义大集”现场会。我算三生有幸，在会前被叫去，看了一次大场面。“首长”和他那一帮省里的，市、地的，县里的头头们的小卧车，成群结队，浩浩荡荡。现场会的头一天晚上的宴会，丰盛极了。鸡鸭鱼肉自不必说，某地的对虾，某地的